

WENSHI ZHISHI

1987



文史知识

7



我的学词经历

吴世昌遗作

《史记》与我国古代传记文学

韩兆琦

漫谈《周易》的智慧

余敦康

绝代才人 薄命君王——南唐后主

李煜新传(1)

田居俭

1986年国内神话研究综述

谢选骏



医药学院610 2 01478530

文史知識

1987年第7期

(总第73期)

-
- | | | |
|-----------------|-------|---|
| • 治学之道 • 我的学词经历 | 吴世昌遗作 | 3 |
|-----------------|-------|---|
-
- | | | |
|--------------------------|-----|----|
| • 文学史百题 • 《史记》与我国古代传记文学 | 韩兆琦 | 8 |
| • 历史百题 • 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下) | 唐嘉弘 | 16 |
-
- | | | |
|-------------------|-----|----|
| • 怎样读 • 漫谈《周易》的智慧 | 余敦康 | 20 |
|-------------------|-----|----|
-
- | | | | |
|------------------|--------------------------|-----|----|
| 诗
文
欣
赏 | 寻梅寻得的苦闷——读乔吉〔双调·水仙子〕《寻梅》 | 黄克 | 26 |
| | 一样题目 写出两样文字 | | |
| | ——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之比较 | 何永康 | 29 |
| | 真趣盎然 童心未泯——高启《牧牛词》赏析 | 李军 | 34 |
-
- | | | |
|--------------------|-----|----|
| • 怎样学习古文(6) • 融会贯通 | 周振甫 | 38 |
|--------------------|-----|----|
-
- | | | |
|---------------|--------|----|
| • 古代科技漫话(4) • | | |
| 我国古代的治黄水利工程 | 李仲均 李卫 | 44 |
-
- | | | | |
|-----------------------|---------|-----|----|
| 文
化
史
知
识 | 谈“葵” | 王冀民 | 49 |
| | 略谈唐代的俸禄 | 迟乃鹏 | 52 |
| | 鹤史零墨 | 莫容 | 56 |
| | 清初的以人殉葬 | 牟小东 | 60 |
-
- | | | |
|---------------------|-----|----|
|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三十七) • | | |
| 明朝的官制(三) | 许大龄 | 65 |
-
- | | | |
|-----------------|-----|----|
| • 金石丛话 • 六、秦石刻文 | 施蛰存 | 70 |
|-----------------|-----|----|
-
- | | | |
|------------------------|-----|----|
| 绝代才人 薄命君王——南唐后主李煜新传(1) | 田居俭 | 75 |
|------------------------|-----|----|
-

人物春秋	西晋名将王濬	李 熊	82
	清初火器发明家戴梓	张文才	87
	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	吴怀祺	93

• 文史工具书介绍 •

研究唐代诗文、历史的必备书《唐人行第录》	沈松勤	98
----------------------	-----	----

• 文史信息 • 中国戏曲晚熟的主要原因 (101)

明代野史的得与失 (101)

日本学者谈中国哲学的特色 (102)

• 书画欣赏 • 书法演变和时代风尚	黄苗子	103
--------------------	-----	-----

宫体诗与后庭花	金启华	107
---------	-----	-----

• 读书札记 • “贺兰山”与“空城计”	卞 慧	110
----------------------	-----	-----

• 青年园地 •

论太平天国后期江南地区商业发展状况	陈映芳	112
-------------------	-----	-----

• 文史信箱 • 什么叫“变风变雅”	闻合竹	117
--------------------	-----	-----

• 文史古迹 • 雕饰奇伟 冠于一世

——漫话云冈石窟艺术	林 石	119
------------	-----	-----

• 文史研究动态 •

新的视界——1986年国内神话研究综述	谢选骏	124
---------------------	-----	-----

补白 6 则	范仲淹反躬自省 (33)	蠹众木折 (37)	开源节流 (55)
	大志非才不就	大才非学不成 (86)	乖气致戾 (92)
	柳公权笔谏唐宪宗 (100)		

郑文公碑	王铎草书(封二)	大同云冈石窟(封三)
------	----------	------------

我的学词经历

吴世昌 遗作



吴世昌字子臧，浙江海宁人。1908年10月5日出生于海宁县硖石镇，1986年8月31日病逝于北京。原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探源》(英文版)、《红楼梦探源外编》及《罗音室诗词存稿》。遗著《罗音室学术论著》四卷，第一卷《文史杂著》已出版，第二卷《词学论丛》即出。

学生时代，我不曾正式学过词，也不象夏承焘、唐圭璋先生他们那样，有一段专门的学词经历。对于词学此道，我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初中时读词，我曾经上当受骗，即：上了索隐派的当，受了注家的骗。我看的第一部词书是张惠言的《词选》，张氏评温庭筠的《菩萨蛮》曰：“此感士不遇也。”评冯延巳的《鹊踏枝》曰：“忠爱缠绵，宛然《骚》《辩》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意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词选》卷一)词的内容与评语连不在一起，看不懂。当时我想：张惠言的评语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是自己不行，天资差。因此，越看越糊涂，越不知其所以然。例如，张惠言说冯延巳进谗言、骗皇帝，我冥思苦想，就是想不通。后来，这部《词选》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进入高中，忙着看外文，也就不再读词。

1928年，考上燕京大学，我读的是英文系，诗词都是在课间九点至十点时读的。有时候也在书店、在理发店里读。空隙时间读书，往往是站着读，没有什么系统。我喜爱李义山的诗，能背诵，并不曾正

规读过，同样，我也很少从头到尾认真看过一部词书。但是，因为对诗词感兴趣，我曾经跑到国文系听顾随、闻宥讲课。顾随写新诗，也写小说，讲课并不正规，常常拿一本《人间词话》随意讲。他讲词，也讲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开始学词，我喜欢二晏，而不喜欢苏、辛。顾随推崇辛弃疾，我可能受了他的影响。一九二九年暑假，我在燕大图书馆专门为辛弃疾写了一篇传记，在《新月》月刊上连载（三卷八、九期）。当时有朋友见到这篇传记，曾劝我搞一本辛词读本，我说：“我不要当马二先生。”这朋友笑了。顾随注重创作，我听他的课，也尝试填词。闻宥讲《清真词》，是专门为国文系开设的。我读《清真词》，选用汲古阁本及六十家词本，自己找出韵脚，学会断句。这是我规规矩矩读过的一部词集。除清真词外，有的词家作品，一时看不懂，就扔开，先看别的。当时，我还看了晏几道、欧阳修、李清照以及辛弃疾等人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才大彻大悟，真正认识到：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由此，我也得出一条经验：要读原始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才不至上当受骗。同时，还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

初学填词，我常与四哥吴其昌磋商，或和韵，或联句，共同探讨。在我的集子里，还保存了一首《金缕曲》（吊圆明园与四哥联句）。但我俩的路子不一样，其昌替我改词，我经常不同意，除非是技术方面的，韵部不熟悉，平仄可能有误，可以接受。其昌有《抱香楼词》（未刊）。我的罗音室词，其中大部分就是大学期间写的。

我在燕大读了七年书（四年本科、三年研究院）。这期间，我的治学兴趣主要放在文史研究方面。我于1930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释〈书〉〈诗〉之“诞”》。1935年所著硕士论文题为《〈诗经〉语词释例》（燕大图书馆藏抄本）。在词学方面尚未有专门著作。但我曾以《罗音室读书偶记》为题，撰写有关词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说到小山词用成句问题，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意思的。文章称：“《小山词·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千古传诵，其实这是成句。五代诗人

翁翊字仲举有五言《闺怨》一律，上半首是：‘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在翁诗中不见得十分出奇，一经小山和上文配合，便尔惊人。”并称：“他（小山）的本领是用了别人的诗，有时反而使读者觉得它比原诗更好——多半是因为他配置得好。”前几年，见到沈祖棻的遗著《宋词赏析》，沈教授在谈到小山的《临江仙》时，恰好也提到“落花”一联。沈教授说：“小晏词用翁诗，以前的词论家没有注意到，因此也没有论及。”其实，早在四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了，也稍稍“论及”了一下，只是那个时候，我还算不上是什么“词论家”。

1938年，我到西北联合大学任讲师，讲授李义山诗、宋词选、修辞学等课，才认真读词，注重词学中的一些问题。1939年，陈立夫将西北联合大学改名为西北大学，并且派文化特务进校，在西北大学压迫进步教授，校务委员许寿裳教授被迫离校赴云南中山大学任教。同年秋，经许寿裳推荐，中山大学来电聘请我为国文系教授，讲授文字学古代文法、要籍目录等课。到中山大学后，我就不再教词，因为已经有了冯沅君。我在西北联合大学教词是承令，到中山大学不教词是让贤。在中大时，曾有《点绛唇》四首，和沅君夫人原韵。词曰：

柳发篱梳，他年还忆篱前水。埋春何际，临镜衰颜是。（温庭筠诗：“衰桃一树临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倦夜灯昏，起视繁星沸。闲中醉，也应欢喜，渐减伤时泪。

弄雾催寒，天涯又发桃花水。旧游难际，肠断知谁是。

树隔长堤，隐约歌声沸。何妨醉。晚晴堪喜，吹尽枝头泪。

坠粉飘红，一春香满堤边水。洗妆眉际，脉脉遥山是。

煮梦敲窗，夜夜高楼沸。春如醉，一分欢喜，万滴伤春泪。

离乱天涯，此生几见春江水。揭来胸际，千古兴亡是。

极目中原，难制肝肠沸。天心醉。十方悲喜，多少征夫泪。

1940年夏，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坪石。1942年，国民党CC份子在中山大学煽动风潮，我因拒绝与CC份子合作而被解聘。此后，我曾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又任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4年夏，受聘为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日本投降后，于1946

年随中央大学复员船迁返南京。在大后方，结合教学工作，对于词学研究也有所积累。我曾以《论读词》为题，在重庆《读书通讯》连载论词文章。并且应罗根泽之约，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上连续发表论词文章：《论词的句读》《论名物训诂隶事之类》《论词的章法》及《论读词须有想象》。当时想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词学导论》，后因出国讲学而中止。

1947年11月17日，我得到英国牛津大学电聘前赴讲学，1948年1月8日抵英，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兼导师，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散文史、中国诗及甲骨文等课。旅英期间，我注重于红学研究，在牛津大学出版了《红楼梦探源》（英文版）。1962年归回祖国，直至1979年，我发表了三十多篇红学专论，编集为《红楼梦探源外编》，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国讲学后三十余年，没有机会进行专门的词学研究工作，但却读了不少词书，并将自己的心得批在书上。随看随批，可能已批了一、二十种。我在1978年以来所发表的论词文章，有的就是根据书中的批语整理而成的。我想将来编写成为一部《罗音室词话》。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被聘请为文学系教授，指导唐宋诗词硕士研究生，1983年又指导词学博士研究生。七、八年间，发表了若干论词文章。解放以来的词学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豪放、婉约划线，“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并且人云亦云，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势力。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我非常不赞成这种错误做法。产生这种错误，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以外，寻根究底，我看还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是胡寅的谬误，二是宋人笔记小说的谬误。胡寅所谓“眉山苏氏（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所谓“《花间》为皂隶”，“柳氏（柳永）为舆台”云云，完全是一派胡言。胡寅不曾传下一首词，也许根本不懂词，但“外行领导内行”，后世的词论家则跟着瞎起哄。这是一大根源。其次，产生这种错误，与宋人爱编造“本事”也有一定关系。例如，有关柳永、周邦彦以及苏轼等人的某些风流韵事都是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而后世论者信以为真，以之作为论词的依据，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

点，明知有误，也要拿来虚张声势。这两个方面的根源非彻底铲除不可。1979年，我在研究生院讲授《词学专题》时就曾指出：

周济《宋四家词选》划苏、辛为一派，以辛弃疾作为头头，苏轼归附之，以为稼轩地位在东坡之上；另一派以秦观为代表。这样分派很不全面，不准确。实际上，秦观的词有的说得一点也不婉约，柳永、李清照也有写得很露骨的；而苏轼三百多首词，写得豪放的，仅是个别几首，辛弃疾是带兵打仗的人，也受了李清照很大影响。此外，周邦彦词，则既不豪放，也不婉约。两派说，无法包括全部宋词。

我反对以豪放、婉约二派论词。我向研究生讲这一问题，遇到有关专家也讲这个问题，有的人不赞同我的意见，但也有赞同的。1982年九、十月间，我在日本讲学时曾明确提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我说不能将苏轼看作豪放派的领袖。我的意见在日本学术界颇为轰动，日报《朝日新闻》称：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这篇讲稿发表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上，题为：《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此外，我还撰写《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九期），对上述观点进一步加以阐发。除了破除豪放、婉约“二分法”，我还准备将宋人笔记小说中胡编乱造的词“本事”，来一番总清算，免得年青一代再次受骗。

我平生为词，不听止庵之所谓“问涂碧山”，而是取径二晏以入清真、稼轩。我最不喜欢梦窗。清末民初某些词人标举梦窗，其目的一是在于借梦窗以抒遗老之情，二是在于借梦窗以掩饰其艳冶生活，三是在于借梦窗以掩盖自己的浅薄无知。对于填词此道，我一向主张“真言语，真性情”。离开这个“真”字，也就丧失了生命力。同时，也只有这个“真”字，才能深切体验古词人之良苦用心，也才能学好词，写出有功于词苑、有益于读者的词论。

《史记》与我国古代传记文学

· 文学史百题 ·

韩兆琦

我国是一个历史散文异常发达、早熟的国家，由现存有文字依据的作品来说，最早的有商朝中期的《盘庚》，其次有西周初期的《大诰》、《牧誓》、《无逸》等，这些都见于《尚书》。到了春秋战国，又相继出现了《国语》、《左传》、《战国策》。这些作品有的是编年体，目的在于记事；有的是国别体，比较偏于记言，甚至也有点象是资料汇编。它们在结构情节、描写场面、以及在刻画人物的心理神情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那种以人物为中心的能被后人称为传记体的作品，这时还没有出现。

真正以崭新的传记体登上历史与文学舞台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既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正式开端，又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最卓绝的代表。它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和传记体的散文与小说确定了规模，树立了样板，对它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其一，本朝人写本朝历史而能够如此的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从而使作品具有如此强烈的批判性，这一点是它以后的历朝正史以及有关的史传文学中所绝无仅有的。司马迁有一种突出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广泛地搜集、占有资料和对资料的辨别选取上。为了写《史记》，司马迁不仅读遍了皇家图书馆、档案馆里的“金匱石室之书”，而且为了寻遗访古他利用一切公私外出的机会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这些活动不仅使司马迁丰富了知识、开扩了眼界，而且使他大大地提高了思想，增强了识别问题的能力。

对事实有认识，对是非有鉴别，还不等于就一定能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在这里司马迁的勇气是令人钦敬的。他能够不顾统治者的喜怒

而毫不含糊地写出他认为应该肯定、应该歌颂，而在当时却是为官方舆论所不容的东西。例如被刘邦所取代的秦王朝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不能算是一个朝代，他们说，汉王朝是直接承继周朝的。而司马迁却不顾这些，他首先为秦国和秦始皇立了两篇本纪，而后在《六国年表序》中又痛斥那些为刘邦捧臭脚说秦朝不是一个朝代的人是吃饭不用嘴而用耳朵。又例如游侠郭解是在汉武帝亲自参与下被杀掉的，而司马迁顶着风头为郭解树碑立传，极力歌颂他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司马迁实事求是的勇气还表现在能战胜个人的好恶。《史记》的主观色彩是很浓的，但司马迁能尽量作到不因为个人的爱憎而改变事实的真象。例如吴起、商鞅、刘邦、吕后这些人，司马迁显然是不喜欢的，但在作品中司马迁都如实地写出了他们才干上的超人和事业上的成功。伍子胥、项羽、李广等人是司马迁所同情喜爱的，但他也如实地写出了他们性格上的重要弱点，预示出他们的悲剧结局绝非偶然。也正因为司马迁在坚持作品的真实性方面作出了如此卓绝的努力，所以早在汉代，班固就曾引用刘向、扬雄的话称赞《史记》是“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曾说过一些对《史记》不满意的话，但他这段对《史记》的褒美也是绝伦的。

鲁迅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对于《史记》的批判性我觉得也应该这么看。正是因为《史记》在极大的程度上写出了汉代社会的真实，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内部的许多阴私与黑暗，所以才使汉武帝以及当时的那些名公巨卿们都对他恨之入骨，甚至使后代那些正统气十足的“学者”们也对他忿忿不平，把他的《史记》称之为“谤书”。关于这一点，我们觉得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司马迁对汉王朝各种问题的看法确实有他片面偏激之处，但作为一个历史家，这种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揭露矛盾，敢于秉笔直书的精神是极其可贵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受了宫刑；又因为他写了《报任安书》，最后竟连是怎么死的都让人没法说了。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历史的长河中高标独树，后世再也没有任何人

可以超过他。以后的历史家几乎都不再写当代，唐朝的历史宋朝人写，宋朝的历史元朝人写，元朝的历史明朝人写，依次类推。而且都是国家开局，组成庞大的写作班子，由宰相亲自挂帅以董成其事，这样修出来的史书当然也就不可能再要求它表现历史家个人的什么思想与寄托了。

真实性、批判性在“正史”中日益萎缩，但却在作家们自己写作的散篇杂体传记文学中发展起来，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前两篇都是自己写自己，后一篇也是写的当时人。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但它们都触及了当时国家政治、社会风习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很强的战斗性，与《史记》的思想、风骨一脉相承。

其二，写历史不是为史而史，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理想，是为了“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表述他写《史记》的目的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什么叫“成一家之言”呢？梁启超解释说：“（司马迁作《史记》）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是从《史记》的整体上讲的。从其中的某一篇来说，司马迁也不是单纯的为某人写某人，为某事写某事，这一点前人也早就看出了。明代陈仁锡说：“子长作传，必有一主宰。”近人高步瀛说：“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主旨，如《吴太伯世家》以‘让’、‘争’二字为主，《鲁周公世家》以相臣执政为主，《陈丞相世家》以阴谋为主，《魏其武安侯列传》以权势相倾为主，《大宛列传》以通使兴兵为主，前半叙通使，以张骞为线索；后半叙兴兵，以宛马为线索，最为谋篇之奇者。”这些对某篇主旨的具体概括，也许不能尽合人意，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指出《史记》每篇都有一主旨，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然，全书“成一家之言”的总目的不就落空了吗？《史记》中有些篇章的主旨的确是很明显的，如《五帝本纪》的歌颂禅让，歌颂天下为公；《魏公子列传》的歌颂礼贤下士，批判昏庸统治者

的自毁国家长城；《淮阴侯列传》的揭示“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历代封建统治者之间的血腥诛杀等等。司马迁的理想，司马迁的追求，司马迁的厌弃与诅咒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司马迁的写理想不是离开史实附加进去什么东西，而是忠于史实，写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个史实、这个规律，越写得典型、深刻，那它对现实社会的比照性和教育性也就越大，用不着作者特别地搞影射，读者自己本来就有丰富机敏的联想。例如关于秦朝的败政，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写道：“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谄欺以取容。”又说：“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读着这些，我们不是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汉武帝时的“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了吗！大司农颜异因为“腹诽”的罪名被杀，注意，这个“腹诽”的罪名似乎连在秦朝都没听说过。汉武帝后期的宰相一连好几个被他杀掉，以至于最后弄得再让谁当宰相，谁就吓得伏地痛哭求饶。当时的情景也是“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贍”。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实啊！事情写得典型、深刻，具有永久性的观照、警戒意义，这是构成《史记》诱人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特点在后代的散篇杂体传记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如韩愈的《梓人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苏轼的《方山子传》，前两篇都是写的下等人，究竟是否真有其人也还不一定；后者写的是陈慥，此人虽然确有族姓，但也与社会人生无大关涉。这些作品突出的都是表现了作者的一种社会理想，一种人生处世的哲学。它的关键是在于说理，至于人物本身的问题倒转而成为次要的了。这种作品直接和《史记》中的《伯夷列传》、《日者列传》等一脉相承。

其三，以人物为中心，以写性格、写典型性为目的，而不注重材

料的多与全。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历史和文学的界限尚不清楚。依司马迁看来，既然要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那就理应在历史和文学上都达到最高的水平。他不满足于《左传》那种编年和《国语》、《国策》那种杂纂，他要创立一种以历代帝王为叙事总纲，以世家、列传为细目的纪传体裁。于是在他呕心沥血的奋斗下，一条生动而丰富多采的历史人物画廊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由于从战国到汉初，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兵火连年，充满苦难的时代，也是一个波澜壮阔，英雄辈出，英雄人物们大有作为，得以充分表演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风习的熏染和司马迁个人独特经历的影响下，《史记》为我们展现的不是一条普通的历史人物的画廊，而是一条英雄人物的画廊；不是一条普通英雄人物的画廊，而是一条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为了塑造这些悲剧英雄人物，司马迁学习了先秦史传的种种描写方法，并把它们发展创造，使之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想一想伍子胥、蔺相如、田单、荆轲、项羽、刘邦这些形象，哪一个不是个性鲜明，情态栩栩如生呢？

司马迁搜集材料是很勤苦的，但使用材料却不是多多益善，他是着力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写出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例如写蔺相如，他抓住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事；写魏公子，他突出了请侯嬴和窃符救赵两件事；写田单他只写了火牛阵一件事。这些人并不是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写了，例如田单后来当了齐国宰相，还又当过赵国的宰相，但是司马迁都没有写，他认为使田单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阵，而不是什么当宰相。他认为要突出这几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有这几件事就足够了。而且也正是为了这一点，他还使用了所谓“互见法”，也就是把那些对于这个人物来说是不能不写，但为了保证人物性格的完整突出而又不便于写入本传的东西，有计划有安排地写到别人的传记中去，让读者可以参酌互见。例如魏公子是有代表其政治见解的大议论的，但是司马迁认为这与《信陵君列传》的礼贤下士的中心不合，因而他把它写到《魏世家》中去了。正因为司马迁在写人方面下了这样的大功夫，所以《史记》中的许多人物都对读者很有感染力。明代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

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传即欲养士也。”以今天的观点看来，司马迁对某些人物的写法和对某些材料的运用，的确不无可议，但是写传记绝不能只是罗列材料，而是必须突出人物性格，这一点，司马迁的确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史记》以后的其他“正史”，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等在描写人物的性格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一般说来，随着理论上历史与文学的分家，写历史的也就越来越不重视，甚至还有意地排斥文学性了。《史记》写人物性格的传统被后代作家们的散篇杂体传记和传记体的散文、小说所继承，并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与光大。其中突出的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以及唐传奇中的《柳毅传》、《虬髯客传》，《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小谢》等触目皆是。可见《史记》对我国写人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

其四，作品有浓重的主观色彩，有强烈的爱憎，有浓厚的抒情性。关于司马迁写《史记》的问题，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道：“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我在《史记选注集说》的前言中也曾经说《史记》是“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饱含着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其所以如此，因为司马迁自己不是政治家，他的治国平天下的见解不能象贾谊、晁错那样可以直接化为贯彻实行的纲领措施；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只能在写人叙事的过程中寓褒贬，别善恶。他在那些伟大、崇高、善良的人物身上，赋予了他们以理想的光辉，从而表现了自己对这种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在那些卑鄙、奸邪、阴险的人物身上，也更突出了他们作为一股反动势力的那种腐朽丑恶的本质特征，流露了自己对这些人的无比愤怒与轻蔑，表现了自己对这股邪恶势力的唾弃与鞭挞。郭沫若《论诗扎记》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短长，也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依照这个原则，即使不必再有其他条件，《史记》也已经是一部五十二万字的大悲愤诗了。更何况

《史记》在“外在韵律”上也是非常讲究的，例如有的作品夹叙夹议，以叙代议，以议代叙，叙议结合，整篇作品就象一首抒情诗，《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也有些作品虽然不能说它整篇都象一首诗，但其中有许多抒情段落，语言的韵律感很强，如《平原君列传》、《鲁仲连列传》、《李将军列传》就是这样的；也有些作品中引入了许多诗、赋和民间的歌谣谚语，尤其是司马迁还安排了许多场面让当事人即景作歌，如伯夷饿死前作《采薇歌》，荆轲临出发时作《易水歌》，项羽被困时作《垓下歌》，刘邦还乡时作《大风歌》，与戚夫人对哭时作《鸿鹄歌》，这些都突出地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气氛；《史记》中还有一部分篇章或是一个篇章里某些部分是押韵的，如《滑稽列传》、《日者列传》等，其效果一方面是突出了滑稽幽默的气氛，同时也增强了文章的韵律性、抒情性。

正由于《史记》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韵律”，同时又有表现方法上的许多讲求，因而就使作品呈现了一种在我国散文史上所少有的主观性、抒情性与气势感。为此，《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具有这种强烈的抒情性与震撼力的作品，在以后的“正史”中我们只能偶尔遇到，如《汉书》的《苏武传》、《新五代史》的《伶官传》等，而其他绝大多数作品都已经变得很平淡、很枯燥了。在后代作家们的散篇杂体传记中继承发扬了《史记》这种强烈抒情性的作品不少，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邵长衡的《阎典史传》，它们有的哀惋，有的凄清，有的悲壮，但它们都能使读者的心灵为之震动，深有《史记》之余韵。

其五，《史记》的篇章结构及其叙事议论的方法，深为后世传记文学所仿效，并成为一种定格。清代赵翼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这是从整体形式上讲的，以

后历代“正史”和许多野史杂传就大体都是模仿的这个样子。

从每个单篇作品来看，开头都是从主人公的姓字籍贯讲起，而后是叙述其生平事迹，最后要讲到主人公的死以及其死后的家族兴衰。每篇作品都还要有一段作者的评论，用“太史公曰”四字领起。这段评论绝大多数是放在作品的末尾，也有个别篇章是放在作品的开头。这段话的内容可以是评论人物，评论事件；也可以是作者借机发挥个人的感慨；也还可以谈点异闻，补充点材料，总之是比较自由的。自《史记》此例一开，不仅后代正史、后人传记全都视之为圭臬，而且连后代传记体的散文和小说也都争相沿用而不变分毫了。韩愈的《毛颖传》是一篇滑稽幽默，嘻笑怒骂，而且又感慨愤疾的散文，其格式以及其说话的声音口角全部是模拟《史记》，而且模拟得维妙维肖，使人为之捧腹。唐宋传奇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也是模仿《史记》，只不过它的议论是直接缀于篇后，不再标出“太史公曰”而已。至于《聊斋志异》，篇末的议论通通以“异史氏曰”四字领起，格式完全与《史记》相同。

《史记》的篇幅最长的是《秦始皇本纪》，共一万三千多字，其次是《高祖本纪》、《项羽本纪》，分别为万字和九千字。最短的是《司马穰苴列传》，只有七百余字。《史记》的多数篇章在三千到六千字之间，总平均为每篇四千字，是比较短的。《史记》人物传记的这种篇幅短小也对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代“正史”中以篇幅长闻名的有《汉书》中的《王莽传》，约三万五千字；《宋史》中的《高宗本纪》，约九万字；《元史》中的《世祖本纪》，约十八万字。但它们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第一是少有的，第二也不能算是文学，而且千百年来只有很少的人看过它。我国的古代传记文学和传记体的散文、小说都以短小精悍著称，不论是本传、别传，也不论是碑文、墓志铭，也不论是寓言体、杂著体的散文和“有为之”的小说，它们的篇幅大都在几千字之间。在很有限的篇幅里，既要叙事，又要写人，还要达到相当高的思想境界，这是《史记》之所长，也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
(下)

唐嘉弘

二、考古发掘遗存的反映

建国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对于我国远古人群及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性认识。截至目前为止，旧石器时代地点约发现三、四百处，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批重点遗址，已经正式发掘。这些发现说明了我国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了解人类遥远的直系祖先或其旁支。

出土资料反映出我国大体上是在人类起源地范围之内，距今约一百五十万年至二百万年已有猿人生存，延续到距今一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从猿人——古人——新人的整个过程。

我们完全有充分根据认为我国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华北、中南等大区均有丰富而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和它们的能与大自然搏斗的勤劳智慧的主人，著名的有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元谋猿人、兰田猿人、郧县猿人、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桐梓人、长阳人、新洞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河套人、建平人、山顶洞人、柳江人等。大量的人类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种系的形成，华夏及其他民族的体质演进、变化、发展等问题，都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华夏先民及其他民族先民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文化内含的演变等问题，也是十分珍贵的难得的资料。我国这些早期人类应当说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主人，从高层次看，他们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的文化